



张亚丽,陈杨洋,项本武.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5, 35(6): 201-212. [ZHANG Y L, CHEN Y Y, XIANG B W. Impact of polici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5, 35(6): 201-212.]

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张亚丽^{1,2}, 陈杨洋¹, 项本武^{1,3}

(1.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2.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3. 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该研究将 2019 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建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14—2022 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剖析城乡要素流动在试点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后,试点地区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是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②机制分析发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助推人口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中介传导途径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县级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在中西部地区、非县级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包括:强化试点政策的监测评估和总结推广、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化通道。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要素流动;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5)06-0201-12 DOI: 10.12062/cpre.20250301

共同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中国城乡、区域以及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占整体收入差距的份额在 50% 以上^[1-2]。自 2008—2019 年期间,虽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缩小,但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3]。为此,国家于 2019 年开展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围绕“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明显缩小”目标,制定了建立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顶层规划与路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运行为本研究考察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揭示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

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充分发挥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深化城乡关系改革的政策选择,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主要目标,并且围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为落实该意见,2019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提出了“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

收稿日期:2024-11-22 修回日期:2025-04-10

作者简介:张亚丽,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E-mail:283472550@qq.com。

通信作者:项本武,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E-mail:xia6142@sina.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的治理内涵与绩效测度研究”(批准号:22&ZD1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国统一大市场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批准号:24CJL036);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数字经济赋能浙江省共同富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批准号:2023C35060)。



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率先建立起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的总体要求,明确了11个方面的试验任务和4项政策保障,并公布了浙江嘉湖片区、福建福州东部片区等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与运行为本研究考察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把“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内容的高度。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更加具体部署,特别强调“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从而构成了本研究探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制的政策背景。

1 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较多文献探讨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代表性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从而意味着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是指全体人民在物质维度上的分配状况(“共同”)和丰富程度(“富裕”)的改善,而非收入不均等的某个维度或成分的局部改善^[5]。也有学者从政治、经济与社会3个方面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系统把握,即国强民共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人民共创共享发展成果,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的社会结构^[6]。在此基础上,现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共同富裕的评估和测度。在理论层面,李实^[4]、刘培林等^[6]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然而这两篇文献只提出了理论方案,并未基于现实数据进行测度。在实证层面,大量文献常常基于共同或富裕单一维度选取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指标,如有的聚焦共同维度,选取城乡、区域、群体收入差距等指标^[7-8],有的聚焦富裕维度,选取相对收入或绝对收入水平等指标^[9-10];还有部分文献则致力于构建包含共同与富裕两个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如不少文献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构建共同富裕指数^[5,11],也有文献基于系列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如陈宗胜等^[12]使用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5个三级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指数。此外,部分文献从收入分配制度^[3]、产业结构调整^[8]、县域创业活动^[9]、机会公平^[13]、公共服务均等化^[14-15]、社会保障及再分配政策^[16-17]、数字经济^[5,18]、最低工资标准^[19]等多个视角,讨论了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 202 •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部分学者基于空间、社会、生态、经济^[20]和公共服务均等化^[21]等层面界定城乡融合的概念,并探讨了实现城乡融合的机制与关键路径^[22-23]。部分学者尝试性地探讨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少数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在发展目标、实施过程上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互促性^[24-25],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在实证层面上,郭冬梅等^[26]基于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政策模拟,从要素配置视角量化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城乡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可以缩小城乡差距;潘明明等^[27]、卫嫚等^[28]分别基于省区市数据和长三角县域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实证检验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围绕共同富裕开展了系列研究,成果丰硕,且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现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前期基础和有益借鉴,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迄今尚无文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对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共同富裕效应进行系统评估。相对于已有文献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政策模拟和基于城乡融合发展指数构建的回归分析,双重差分方法具有控制未观察到的其他共时性因素、减少选择偏差和更精确评估因果净效应的优势^[29]。第二,缺乏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影响机制检验。现有文献主要从人才建设、市场拓展、政府干预的视角展开机制检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发挥效果的影响过程和传导机制有待系统深入分析。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①本研究借助2019年国家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独特政策实验,基于政策效应评估经典的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城乡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思路,为准确判断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提供重要补充。②本研究基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视角检验了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机制,据此提出了政策体系优化的主攻方向,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决策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以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和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关键,聚焦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11个方面体制机制建设,这些体制机制建设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对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产生重要影响。从直接渠道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协同发展及推进农民增收等机制建设,从直接渠道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从基础设施一体化来看,通过实施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和管护,并创新多元化的分类投入体系,落实市域(郊)铁路、乡村产业路旅游路和冷链物流设施等建设,有利于构建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网络。已有研究表明,完整而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畅通运行,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30-31]。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看,通过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建立城乡教育联合体和县域医共体,能够有效化解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和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形式^[3],可以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调节,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32],从而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从产业融合发展来看,通过在试验区内选择一批产业园区或功能区,率先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有利于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通过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入乡,提高农业生产率,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有研究表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村减贫、推动农民就业和增收,从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33]。从推进农民增收来看,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有助于补齐政策短板,为农民财产性收益及劳动性收入的持续增加提供制度保障。已有研究表明,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能够有效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快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进程^[34-35]。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2.2 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除了上述直接渠道的影响外,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还通过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要素、产品、信息等城乡间的充分流动^[36],破除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是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37]。对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而言,试点政策要求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全面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返乡就业创业者在其原籍或工作地

落户,有利于降低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成本,从而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而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会使城乡劳动力要素的报酬趋于均等化,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8-39]。对于土地要素流动而言,试点政策要求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从而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这一制度建设将有力促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缩小城乡要素市场的差异,有助于提升级差地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0]。农村土地流转间接提升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1]。对于资本要素流动而言,试点政策要求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通过推进抵押融资、担保融资及抵押贷款形式,有利于引导市场资金流向农村地区,此外,试点政策要求设立城乡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助于弥补农村资金缺乏的短板,打破乡村封闭独立的资金循环^[42]。资本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有助于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城乡之间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劳动力、土地及资本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3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3.1 样本与数据说明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确立了浙江嘉湖片区、福建福州东部片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山东济青局部片区、河南许昌、江西鹰潭、四川成都西部片区、重庆西部片区、陕西西咸接合片区、吉林长吉接合片区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包含83个县级行政区和3个县级开发区,本研究将其中的县级行政区定义为实验组,将全国除港澳台、西藏、新疆外其他县级行政区定义为对照组。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剔除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县(市、区)外,最终得到由46个试点县级行政区构成的实验组,其余1582个县级行政区构成的对照组,覆盖中国28个省份。2019年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关键节点,选取政策实施前5年的数据有助于提供较长时间窗口,更为准确地评估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此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批复的试验区均为县级行政区域及少数县级开发区,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2014—2022年的中国县域面板数据,各个变量指标与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及各县(市、区)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分县)、《中国统计年鉴》,



并以 2014 年为基期对各期经济数据进行平减处理,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

共同富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是在实证测度时,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经济”层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数^[5,10],原因在于,基于“经济”层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数能够反映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43]。李实^[4]认为,推进共同富裕,缩小“三大差距”,最重要的是缩小收入差距。龚斌磊等^[44]指出,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最常用且最具代表性的指标,能够有效反映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富分配。万海远等^[45]表明,人均收入指标是最具代表性、容易被接受、也最能反映共同富裕水平的结果指标,而且聚焦于经济层面的分析,能够直接揭示共同富裕的进展。从近期文献的实证测度来看,彭刚等^[19]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富裕”水平,使用泰尔 T 指数度量“共同”水平;万海远等^[45]选取人均国民收入度量“总体富裕”水平,使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反映“共享富裕”;而万广华等^[5]使用人均收入度量“富裕”水平,使用“1 - 基尼系数”度量“共同”水平。参考万广华等^[5]的测度方法,本研究选取人均收入指标,从“共同”与“富裕”两个维度构建城乡共同富裕指数。其中,富裕程度采用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该比值越大,表明“富裕”水平越高;共同程度使用“1 - 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 T 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表明“共同”水平越高。其中 T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

$$T_{it} = \sum_{j=1}^2 \frac{I_{jt}}{I_t} \times \ln \left(\frac{I_{jt}/I_{it}}{P_{jt}/P_{it}} \right) \quad (1)$$

式(1)中: T 表示泰尔指数; i 表示县域; t 表示年份; $j = 1, 2$,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 I_{jt} 代表 t 年的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I_{it} 表示 t 年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 P_{jt} 代表 t 年城镇常住人口或农村常住人口; P_{it} 表示 t 年县域总

常住人口。

在综合考虑“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参考万广华等^[5],本研究构建如下共同富裕指数:

$$y_{it} = \left(I_{it}/L_{it} \right) \times (1 - T_{it}) \quad (2)$$

式(2)中: L_{it} 表示 t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n 表示国家,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当富裕程度为 0 或者共同程度为 0 时, $y = 0$;即使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再高,只要分配极度不公,就完全不是共同富裕;同样地,无论分配多么公平,只要县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很低(接近于 0),也完全不是共同富裕(表 1)。

3.2.2 核心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反映县(市、区)是否被纳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所确定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中。变量设置方法为,若某县(市、区)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地区,则从 2019 年当年及之后各年均赋值为 1,否则为 0(表 1)。

3.2.3 中介变量

为验证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本研究将引入土地要素流动、人口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分别进行机制检验。

(1)土地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推进了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不仅满足了农村居民对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需求,而且随着农用地向非农用地的合理转化,也满足了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需求。土地要素流动既包括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又包括非农用地复垦,参考平卫英等^[46]的研究,土地要素流动用建成区面积占比表示(表 1)。

(2)人口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和鼓励人才的返乡就业创业,促进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通过促进城乡人口的再平衡而实现共同富裕。人口要素流动既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包括城市人口下乡,由于城市人口下乡的数据难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水平	y	见式 4 构造方法
解释变量	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x	某县(市、区)是否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地区
	产业发展水平	$h1$	县域二三产业增加值/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教育水平	$h2$	县域中小學生人数/县域总人口数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水平	$h3$	县域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福利设施水平	$h4$	县域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的自然对数值
	居民储蓄水平	$h5$	县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县域总人口数之比的自然对数值
	人口要素流动	$m1$	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土地要素流动	$m2$	建成区面积/土地总面积
机制变量	资本要素流动	$m3$	县域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以获得,同时,人口城镇化指标可以较好地刻画城乡人口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参考何红光等^[42]、杨一鸣等^[47]的研究,人口要素流动用人口城镇化水平表示(表1)。

(3)资本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要求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设立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则会促进市场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地区,通过加速资本要素流动而影响共同富裕。资本要素流动可以通过城乡之间存贷款流动、财政转移支付、产业投资等形式实现,鉴于当前涉及农村地区指标的相关数据严重缺失,使得准确测算城乡之间资本要素流动变得比较困难,本研究借鉴钱力等^[48]的研究,用县域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县域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表1)。

3.2.4 控制变量

为了考察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净影响,本研究还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其他经济社会变量(表1),具体包括:①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变迁导致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流动,进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49]。已有研究表明,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对降低城乡收入比有着重要影响^[50]。②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对减贫增收至关重要^[51],因为教育水平对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促进收入增长具有长期影响^[52]。③政府干预水平。政府承担贫富差距调节的责任^[53],政府的宏观调控直接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农民收入等领域产生影响。④福利设施水平。福利设施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调节,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32]。⑤居民储蓄水平。已有研究表明,有计划的储蓄行为能降低家庭的贫困程度^[54],进而影响共同富裕水平。

3.3 模型构建

3.3.1 基准回归模型

本研究实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2019年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试行,不仅使同一试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在政策实施前后产生差异,也可能使同一时点上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在试验区与非试验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评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共同富裕效应,本研究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基准模型,表达式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beta_1 h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 x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实施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若实施该试点政策则取1,未实施则取0。 α_1 为待估参数,表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净效果。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h_{it} 为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一系列县域层面控制变量。

3.3.2 机制检验

依据理论机制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来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为此,参考江艇^[55]的中介效应研究思路,构建式(4),与式(3)共同构成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具体形式为:

$$m_{it} = \theta_0 + \theta_1 x_{it} + \beta_2 h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式(4)中: m_{it} 表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影响城乡共同富裕的机制变量,包括人口要素流动、土地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其余变量的含义同式(1)。本研究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表2。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是否能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列(1)为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列(6)为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样本量	(2) 均值	(3) 标准差	(4) 最小值	(5) 最大值
y	13 978	0.610 9	0.201 0	0.138 0	1.952 4
x	13 978	0.004 9	0.069 6	0	1
h_1	13 978	0.808 9	0.107 5	0.244 7	0.995 0
h_2	13 978	0.125 1	0.038 4	0.018 8	0.293 4
h_3	13 978	0.270 6	0.187 1	0.005 0	2.075 4
h_4	13 978	2.433 8	1.051 7	0	6.313 5
h_5	13 978	10.331 2	0.527 3	7.385 1	12.321 8
m_1	13 978	0.305 8	0.136 8	0.015 9	0.999 4
m_2	11 698	0.012 4	0.015 4	0.000 1	0.311 9
m_3	13 969	0.772 8	0.424 0	0.021 9	7.634 8

明,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仍为正向显著,说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综上所述,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假设1得以验证。

4.2 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的要求是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有效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准年份,设定城乡融合试点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时间虚拟变量,以此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之前,试验区和非试验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试点开展当期开始,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能显著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这一结果强化了本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其他不可观测的竞争性因素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以确保本研究的研究结论由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驱动而非不可观测因素驱动,参考宋弘等^[56]研究,进一步使用间接安慰剂检验的方式加以验证。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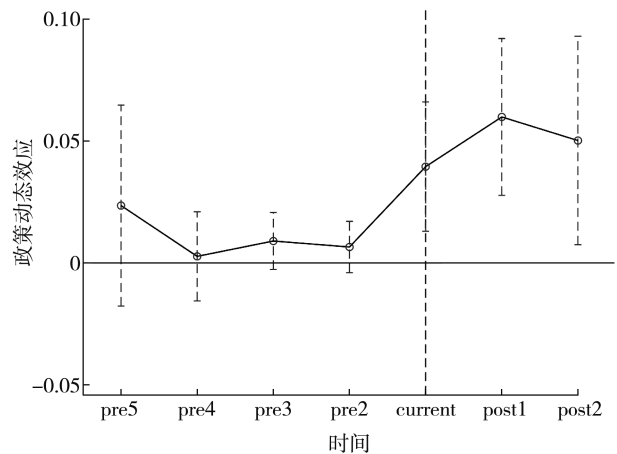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地,本研究随机产生一个城乡融合试点政策的试验区名单,从而产生一个有误的估计系数,并重复该过程500次,从而描绘出估计系数的分布图,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0值附近,服从正态分布,且实际估计系数明显属于异常值,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

4.3.2 PSM-DID 检验

为解决可能存在由样本选择偏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利用PSM-DID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首先选取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为协变量,使用核匹配的方法进行倾向评分匹配(PSM),其次将匹配后的样本替换为控制组,最后再利用DID模型重新估计城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					
	(1)	(2)	(3)	(4)	(5)	(6)
x	0.036 9*** (0.013 0)	0.035 2*** (0.012 7)	0.036 5*** (0.012 9)	0.036 1*** (0.012 8)	0.036 5*** (0.012 9)	0.037 5*** (0.012 9)
$h1$		0.135 9*** (0.012 1)	0.129 8*** (0.012 0)	0.101 6*** (0.012 9)	0.103 6*** (0.012 9)	0.104 4*** (0.012 9)
$h2$			0.291 9*** (0.045 4)	0.294 0*** (0.045 5)	0.297 6*** (0.045 4)	0.274 3*** (0.045 3)
$h3$				-0.039 7*** (0.006 1)	-0.039 4*** (0.006 1)	-0.040 4*** (0.006 1)
$h4$					-0.001 9** (0.000 8)	-0.001 9** (0.000 8)
$h5$						0.010 1*** (0.003 9)
常数项	0.610 7*** (0.000 4)	0.500 8*** (0.009 8)	0.469 2*** (0.010 7)	0.502 4*** (0.011 8)	0.505 0*** (0.011 9)	0.403 0*** (0.041 2)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3 978	13 978	13 978	13 978	13 978	13 978
R^2	0.962 5	0.962 9	0.963 1	0.963 2	0.963 2	0.963 3

注:** $P<0.05$,*** $P<0.01$;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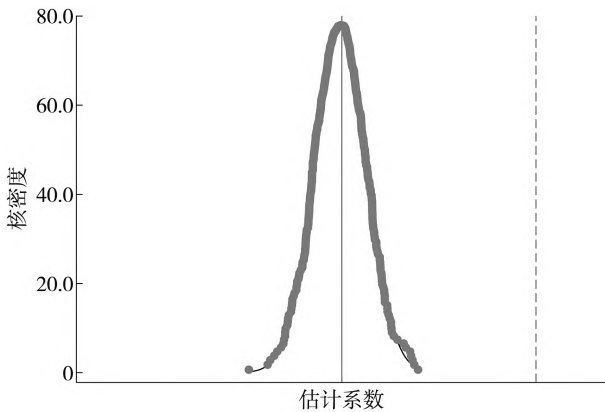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表4列(1)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即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4.3.3 剔除北京、上海和浙江的样本

考虑到北京、上海和浙江3个省(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经济体量、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优越性,可能会对政策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北京、上海和浙江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列(2)。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为4.33%,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4.3.4 剔除竞争性政策的影响

考虑到在本研究时期内开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等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会产生影响,从而可能对前文结论产生干扰,因此,为避

免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是受其他竞争性政策的影响,本研究将这些政策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再次进行回归。表4列(3)—列(4)分别展示了剔除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均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依然有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5 进一步分析

5.1 异质性分析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不同地理区域、县级行政区划属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影响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

5.1.1 基于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不同地理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在财政收入、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不及东部地区,因此,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地理区域方面的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地理区域差异将样本分为东部县域样本和中西部县域样本进行回归,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列(1)—列(2)展示了在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列(3)—列(4)展示了在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列(1)结果表明,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东部县域样本的系数为0.0257,列(2)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东部县域样本的系数为0.0264,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列(3)结果表明未加入控制变量时,中西部县域样本的系数为0.0426,列(4)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中西部县域样本的系数为0.0416,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城乡融合发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DID	剔除北京、上海和浙江样本	剔除竞争性政策	
	(1)	(2)	(3)	(4)
x	0.035 5*** (0.008 5)	0.043 3** (0.014 4)	0.038 5** (0.012 9)	0.037 3** (0.012 8)
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Yes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试点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395 6*** (0.040 4)	0.385 8*** (0.040 9)	0.405 9*** (0.041 3)	0.406 4*** (0.041 3)
样本量	12 014	13 623	13 978	13 978
R^2	0.119 4	0.960 0	0.963 3	0.963 3

注: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出现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县域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有助于促进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进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57]。而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始终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始终位于中国前列^[58],因此,在样本期内,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边际促进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如郑雨等^[59]发现,东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发达且服务体系相对成熟,经济发展政策在此背景下的边际效益相对较小,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相较于中部地区也较为有限。

表 5 东、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1)	(2)	(3)	(4)
x	0.025 7 (0.017 1)	0.026 4 (0.016 8)	0.042 6*** (0.012 8)	0.041 6*** (0.013 1)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23 0*** (0.000 7)	0.306 0** (0.069 1)	0.568 7*** (0.000 3)	0.513 2*** (0.049 0)
样本量	3 807	3 807	10 171	10 171
R^2	0.967 8	0.969 4	0.955 8	0.956 9

注:** $P<0.05$,*** $P<0.01$;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5.1.2 基于县级行政区划属性的异质性分析

同为县级行政区域,但行政区划属性的不同,可能带来财政支撑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不同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研究样本按照县级行政区划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县级市和非县级市,进一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不同县级行政区划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6。列(1)—列(2)展示了在县级市,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县级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系数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列(3)—列(4)展示了在非县级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非县级市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能提升非县级市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出现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县级市通常城镇化水平较高且以非农就业为主,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小,导致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

策对共同富裕的边际促进作用较小;而非县级市的城乡仍存在较大收入差距,共同富裕水平较低。因此,相比县级市,非县级市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 6 县级行政区划属性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县级市		非县级市	
	(1)	(2)	(3)	(4)
x	0.032 9 (0.027 7)	0.033 5 (0.027 2)	0.035 5*** (0.013 9)	0.035 9*** (0.013 8)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52 4*** (0.000 9)	0.477 3*** (0.106 9)	0.577 4*** (0.000 4)	0.428 3*** (0.042 4)
样本量	2 659	2 659	11 319	11 319
R^2	0.950 5	0.952 6	0.961 1	0.961 7

注:** $P<0.05$,*** $P<0.01$;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5.1.3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产业融合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财政支撑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实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同样可能存在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全样本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7。列(1)—列(2)展示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样本的系数均为 0.050 1,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列(3)—列(4)展示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样本的系数为 0.007 3,加入控制变量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样本的系数为 0.002 7,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更强。可能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梯度特征明显^[60],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城乡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更落后,落后县域能够凭借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带来的财政投入迅速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推动共同富裕。而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发展差距较小,居民生活质量逐渐趋同^[59];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对政府相关政策的依赖较弱^[9],因



此,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

表7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1)	(2)	(3)	(4)
x	0.0501*** (0.0164)	0.0501*** (0.0163)	0.0073 (0.0128)	0.0027 (0.0132)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5865*** (0.0004)	0.4076*** (0.0450)	0.8452*** (0.0012)	0.4917*** (0.1197)
样本量	12667	12667	1311	1311
R^2	0.9536	0.9549	0.9759	0.9772

注:** $P<0.05$,*** $P<0.01$;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5.2 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假设,本研究将继续验证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检验的思路,对式(4)进行检验,以进一步探究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结果见表8。

表8列(1)和列(2)展示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人口要素流动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乡间的人口要素流动,推动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试验区通过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的转移,有助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报酬提升^[61];而且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逐渐减少,也为留守农村的农民提供了充裕的生产和资源空间,有助于促进农村就业人

员收入提升,从而促进城乡劳动力收入趋向收敛。另一方面,试验区通过建立人才加入乡村制度,促使越来越多原籍普通高校毕业生、外出农民工和经商人员,以及部分城乡人口回乡就业创业,为农村发展带来新的知识、理念、技术和管理模式,为农村经济振兴注入活力^[62],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由此可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助推人口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中介传导途径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表8列(3)和列(4)展示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土地要素流动的检验结果。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回归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乡间的土地要素流动,推动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试验区通过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有助于促进土地要素的流动,带动了建成区面积占比的上升,推动农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化,以满足非农产业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通过城乡间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促进了多产业融合发展,繁荣乡村经济,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从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63]。此外,土地作为城乡居民生存和生活的基础,其合理流动有助于科学规划土地功能,优化农村土地利用结构,从而促进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64],推动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趋同,从而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助推土地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中介传导途径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由表8列(5)和列(6)展示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资本要素流动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该回归结果表明,城乡

表8 作用机理检验结果

变量	$m1$		$m2$		$m3$	
	(1)	(2)	(3)	(4)	(5)	(6)
x	0.0290** (0.0143)	0.0319** (0.0141)	0.0013*** (0.0003)	0.0017*** (0.0004)	0.0873** (0.0364)	0.1371*** (0.0369)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3056*** (0.0004)	0.0464 (0.0531)	0.0124*** (0.0001)	0.0107 (0.0122)	0.7723*** (0.0017)	-1.4729** (0.5652)
样本量	13978	13978	11698	11698	13969	13969
R^2	0.9029	0.9055	0.8391	0.8394	0.8003	0.8240

注:** $P<0.05$,*** $P<0.01$;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乡间的资本要素流动,推动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试验区通过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设立城乡融合发展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举措,有助于促进资本要素的流动,带动了县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比的上升。一方面,资本要素向农村的流动,有助于弥补农村地区发展资金不足的短板,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络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资本要素向农村的流动,有助于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乡村经济活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通过助推资本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中介传导途径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综上,假设2得以验证。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4—2022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本研究实证分析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且在通过安慰剂检验,倾向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剔除北京、上海和浙江的样本,剔除竞争性政策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通过助推土地要素流动、人口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效应。③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非县级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强化试点政策的监测评估和总结推广。在试点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抓手,以推进共同富裕为宗旨,加强政策落实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及时纠正偏差,确保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有效执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支持等形式加大对试验区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支持试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投资。通过充分发挥试点的先行优势和引领作用,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运用到更大的空间尺度,推动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化,从而更好地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第二,针对不同区域实施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而言,城乡融合发展可以侧重于完善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推进城乡产

业融合。例如,通过加强城乡交通网络建设,提升道路通达性和农村物流效率;同时,鼓励农业与旅游、加工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特色经济,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从而为城乡要素流通、农村产业发展及农民收入提高创造外部条件,为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对于发达地区的县域而言,城乡融合发展可以将重点放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两个方面。例如,通过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提升服务均等化水平;同时,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鼓励先进技术在农业、乡村治理等领域推广应用。从而为城乡居民生活的等值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科技支撑,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迈向更高水平。

第三,着力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化通道。对于人口要素,一方面,注重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服务质量,通过农民工创业培训、用工对接会等方式,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开展自主创业、就业,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另一方面,鼓励城市人才返乡下乡,当地政府应设立创业基金、人才专项资金等激励措施,改善承接城市回流人口与企业的经济环境,加快农村地区人才回流。对于土地要素,通过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的标准,结合各地方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升土地流转、入市和增减挂钩等过程中农民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比例,不断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资本要素,首先,通过对投资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尤其是对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给予优惠,吸引社会资本流入农村;其次,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推动低利率贷款,降低信贷门槛,满足农村居民的融资需求;最后,支持建立行业协会、产业合作社及现代农业园区,加强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培育,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 WAN G H, LU M, CHEN Z.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7, 53(1): 35-59.
- [2] 万广华. 城镇化与不均等: 分析方法和中国案例[J]. 经济研究, 2013, 48(5): 73-86.
- [3] 李实, 朱梦冰.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 管理世界, 2022, 38(1): 52-61.
- [4]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 2021, 56(11): 4-13.
- [5] 万广华, 宋婕, 左丛民, 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 方法与证据[J]. 经济研究, 2024, 59(6): 29-48.
- [6]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8): 117-129.
- [7] 尹志超, 文小梅, 栗传政.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J].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1):109-127
- [8] 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 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J]. 经济研究,2022,57(7):84-100.
- [9] 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 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23,58(3):40-58.
- [10] 王修华,赵亚雄.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J]. 经济研究,2023,58(9):98-115.
- [11] 万海远,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12] 陈宗胜,杨希雷. 论中国共同富裕测度指标和阶段性进展程度[J]. 经济研究,2023,58(9):79-97.
- [13] 史新杰,李实,陈天之,等. 机会公平视角的共同富裕: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22,57(9):99-115.
- [14] 陈斌开,亢延锟,侯嘉奕. 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J]. 经济学(季刊),2023,23(6):2104-2118.
- [15] 李实,杨一心. 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22(2):27-41.
- [16] 杨穗,赵小漫. 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保障再分配的实践、成效与启示[J]. 管理世界,2022,38(11):43-56.
- [17] 唐高洁,闫东艺,冯师章. 走向共同富裕: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分析[J]. 经济研究,2023,58(3):23-39.
- [18] 周文,韩文龙.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J]. 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23.
- [19] 彭刚,杨德林,姚星,等. 最低工资标准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2):47-67.
- [20] 施建刚,段锴丰,吴光东,等. 碳排放约束下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效率[J]. 经济地理,2021,41(6):57-67.
- [21] 罗婉璐,王武林,林珍,等. 中国城乡融合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2023,42(4):629-643.
- [22]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 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 [23] 金成武.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J]. 经济研究,2019,54(8):183-197.
- [24] 朱志伟.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33-43.
- [25] 陈志钢,茅锐,张云飞.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2(7):68-78.
- [26] 郭冬梅,陈斌开,吴楠. 城乡融合的收入和福利效应研究:基于要素配置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23,39(11):22-46.
- [27] 潘明明,孔琴. 城乡融合发展何以赋能区域共同富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4,40(2):12-18.
- [28] 卫嫚,黄泰.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以长三角地区60个典型县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24,39(7):1591-1612.
- [29] 王庶,岳希明. 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J]. 经济研究,2017,52(4):106-119.
- [30] 刘晓光,张勋,方文全. 基础设施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J]. 世界经济,2015,38(3):145-170.
- [31] DONALDSON D, HORNBECK R.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market access" approac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2): 799-858.
- [32] 姜晓萍,吴宝家. 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历程、成就与经验[J]. 管理世界,2022,38(10):56-70.
- [33] 卢京宇,郭俊华. 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3,44(11):105-117.
- [34] 涂圣伟. 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构建[J]. 改革,2023(4):14-25.
- [35] 周力,沈坤荣.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来自“三权分置”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22,57(5):141-157.
- [36] 金成武.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J]. 经济研究,2019,54(8):183-197.
- [37] 周慧珺,傅春杨,龚六堂. 就业政策如何影响收入分配: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J]. 管理世界,2024,40(1):38-63.
- [38] 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2004,39(6):50-58.
- [39] 李兰冰,姚彦青,张志强. 农村劳动力跨部门流动能否缩小中国地区收入差距?[J]. 南开经济研究,2020(4):127-143.
- [40] 张占录,李鹏辉. 土地发展权交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重庆地票实践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22(3):36-49.
- [41] 冒佩华,徐骥.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 管理世界,2015,31(5):63-74.
- [42] 何红光,李雅君,戴振阳,等.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24(1):76-88.
- [43] 尹向飞. 收入视角下我国共同富裕指数的测算与分解:基于CFPS数据[J]. 统计研究,2024,41(12):3-14.
- [44] 龚斌磊,钱泽森,李实.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12):5-26.
- [45] 万海远,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2021,42(12):18-33.
- [46] 平卫英,李文星,罗良清.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39(6):15-31.
- [47] 杨一鸣,王健,吴群.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22,41(12):2191-2202.
- [48] 钱力,张轲.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2):103-116.
- [49] 吴万宗,刘玉博,徐琳. 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管理世界,2018,34(2):22-33.
- [50] 周立群,王向. 城乡融合、服务业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2013,39(10):119-132.
- [51] 孙久文,张静,李承璋,等.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与发展建议[J]. 管理世界,2019,35(10):150-159.
- [52] 汪德华,邹杰,毛中根. “扶教育之贫”的增智和增收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评估[J]. 经济研

- 究,2019,54(9):155-171.
- [53] 陈海若. 共同富裕: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难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回答[J]. 经济学家,2024(5):25-35.
- [54] 郭熙保,周强.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J]. 经济研究,2016,51(6):143-156.
- [5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56] 宋弘,孙雅洁,陈登科. 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2019,35(6):95-108.
- [57] 程钰. 人地系统演变与优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307-308
- [58] 何昀,王帅尧,谢迟.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时空分异与障碍因素[J]. 经济地理,2024,44(4):12-21.
- [59] 郑丽,王怡嘉.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39(8):59-73.
- [60] 万广华,罗知,张勋,等. 城乡分割视角下中国收入不均等与消费关系研究[J]. 经济研究,2022,57(5):87-105.
- [61] 许岩. 市民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共同富裕:对“农转非”居民工资同化过程的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22(3):130-148.
- [62] 杜国明,刘美. 基于要素视角的城乡关系演化理论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21,40(8):1298-1309.
- [63] 戈大专,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J]. 地理学报,2020,75(6):1272-1286.
- [64] 龙花楼,张英男,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2018,73(10):1837-1849.

Impact of polici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HANG Yali^{1,2}, CHEN Yangyang¹, XIANG Benwu^{1,3}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3. Institute of Zhejiang Rural Revitalization,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path to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these areas. This study t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2019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ese counties from 2014 to 2022, the study us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n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n this basis,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the role of urban-rural factor flow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pilot policie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①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se zones. This conclusion still hel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dicating that this wa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②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olicies enhanced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mediating channels of promoting the flow of population, land, and capital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③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countie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county-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licies had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on-county-level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 lower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pilot policies and summarizing and promoting their outcomes; implementing dynamic and differentiate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channels for two-way fre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factor flow;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责任编辑:蒋金星)